



我曾跟随费孝通先生回访他的家乡。在列车上，列车员陈娟为费老画了一幅速写。费老端详后说：“三分像我，再加三分，不错不错。”又觉应鼓励一下“画家”，他又说：“还有四分，不是不像我，而是我自己不认得我。”车厢内顿起一片笑声。

有谁会如此智慧地自嘲？

不认得“我”

● 王乾荣

不说你这个“大画家”画技欠佳，反而自嘲“老眼昏花”，不识自己真面目。这位仁慈、大度的世界级社会学家，在学术

上责己甚严，但从不盛气凌人，也决不中庸妥协。比如，这番貌似“戏说”的论画之语，字里行间不也流露着他的真实评价吗？只是他的评价中，蕴含着深沉的温暖和爱！



漫品武侠



电视剧《武林外传》中，女主角佟湘玉有一段关于“侠”的台词颇为精彩。她说，“侠”由“人”和“夹”字构成，因此大侠便是那些被众人夹道欢迎的人。佟湘玉此言有所指，因郭芙蓉自诩为女侠，虽四处“行侠仗义”，实则给小镇百姓添乱，甚至犯错而不自知，遭到众人指责。

佟湘玉谈侠，虽未触及侠的核心，稍显偏颇，却也捕捉到侠的一个重要特点：侠者为大众做事，理应受到大众欢迎。再者，侠客行侠仗义，其服务对象必是与自己“无关”的人。无关即非亲非故。为非亲非故者出手，方为行侠仗义；若为亲友出手，则只能算作相助，非侠义之举。

无论是古典名著还是武侠小说，其中的侠义之士往往为与自己无关的人出手相助。《水浒传》中的鲁智深，为救素不相识的弱女子金翠莲，三拳打死镇关西；拼命三郎石秀，路见不平，替与自己本无交情的杨雄打抱不平。因此，鲁智深与石秀都是真正的侠者。

在金庸的武侠世界里，侠客辈出。令狐冲救小尼姑仪琳，是不忍见其落入采花贼田伯光之手，尽管他们同属五岳剑派，但各派独立，互不相干；胡斐为救素昧平生的钟阿四一家，与土豪凤天南结仇。令狐冲与胡斐仗义出手，甘愿为无关之人牺牲，这便是侠，他们是真正的侠客。

金庸先生曾借郭靖之口阐述侠义精神。郭靖对杨过说：“我辈练习功武所为何事？行侠仗义，济

说侠

文/迂夫子 图/勾建山

人困厄，固然乃是本分，但这只是侠之小者，江湖上所以尊称我为一声‘郭大侠’，实因敬我，为国为民，奋不顾身地助守襄阳……只盼你心头牢牢记着‘为国为民，侠之大者’这八个字……”

“为国为民，侠之大者”，这八个字掷地有声。郭靖作为一介平民，能在外敌入侵时挺身而出，并组织义军保卫襄阳，展现了大侠风范。那些保护邻里的小侠与他相比，自然有所不及。因此，梁启超有言：“侠之大者，为国为民；侠之小者，为友为邻。”但无论如何，侠的概念中必有“无关”的因素。他人之难，虽与己无关，但仍当作己事，拔刀相助，此乃侠者仁心。无论大侠还是小侠，皆值得尊敬。大侠有大侠的格局，小侠有小侠的胸襟，侠义之士必具舍己为人之勇气和献身精神。

古之侠者或武侠小说中的侠客，常打打杀杀，藐视法律，与当今法治社会格格不入。然而，无论社会如何变迁，可以无侠客，但不能无侠义之气。扶危济困，见义勇为，仍是社会不可或缺的风气。大侠永不过时，只是此“大侠”未必是武艺高强的侠客，亦可能是普通百姓，其行侠仗义的武器也未必是刀枪，也可以是法律武器。

当今时代，武侠小说中血雨腥风的江湖已不复存在，动辄刀枪相见的大侠也难融入法治社会。但侠之精神不能缺失，否则当歹徒行凶，弱小被欺凌时，若众人皆漠然处之，冷眼旁观，这样的世界何等悲哀？



生活就是这样：
你也渐渐地与白痴无异
如果你白痴总是高度认可
做事不必强求所有人满意
尤其怕你眼里的白痴挑剔
单位食堂做了一道大锅菜
虽然多数人认可菜的味道
但众口难调有人发起牢骚
老赵反感大锅菜里有豆腐
老钱嫌弃大锅菜里没丸子
老孙不满大锅菜里肉太多
老李厌恶大锅菜里白菜少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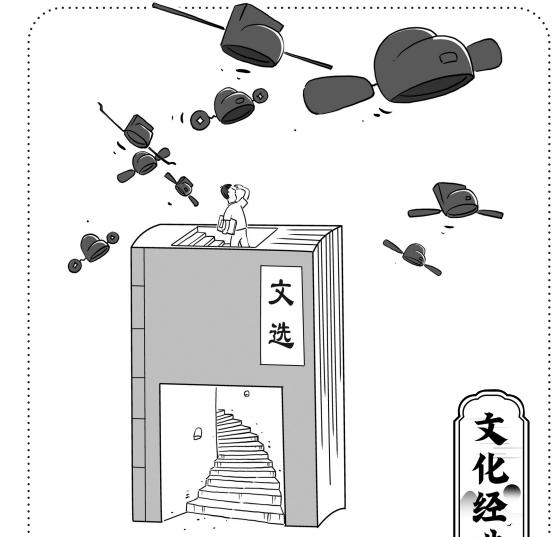
生活就像众口难调

文/阿福

图/勾犇



灶台物语



《文选》： 古代科考必读书目

文/友多闻 图/马宏亮

《文选》是中国现存最早的一部诗文总集，由南朝梁武帝长子萧统组织文人共同编纂。萧统死后赠谥号“昭明”，因此他主编的这部文选也称作《昭明文选》。

《文选》因其严谨的选学态度和荟萃的精品，备受后世推崇。到唐代时，《文选》与《五经》一样被列为科举考试的必考科目。当时甚至流传着“文选烂，秀才半”的民谚，意指熟读《文选》便能成为半个秀才。到了宋代，更是把《文选》称为“文章祖宗”。

鲜为人知的是，组织编撰《文选》的编录者萧统，竟是一位年仅25岁的青年。现在25岁的年轻人，大都刚走出校门，面临着“考研”还是“找工作”的迷茫。而1500年前，这位25岁的年轻人却干了这样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。

当然，这个年轻人不是一般的年轻人。萧统是南朝梁武帝的太子，皇宫里拥有3万多册藏书，还有一批志同道合的学子和他一同完成这项艰巨的任务，但《文选》的成功也从侧面印证了他出众的才华和远大的抱负。

《文选》所选作品，上自周秦，下迄齐梁，从浩如烟海的作品中精选出来，汇集而成。除无名氏外，共选了129位作家，752篇作品，分为60卷，涵盖赋、诗、杂文3大类，又细分成赋、诗、骚、七、诏、册、令、教等38小类。其中，赋和诗占比最大，赋按内容分为京都、郊祀、耕籍等15门，诗分为补亡、述德、劝励等23门。这种分类方法首次为“文学”与“非文学”作品划定了界限，解决了中国文学自先秦以来文史不分的现象。

魏晋南北朝时期，中国文学已独立于政治和历史等领域，成为专门的学问。随着文学作品数量的增多，对其进行品鉴、筛选和提炼的需求也日益迫切。因此，选录优秀作品的文学总集应运而生。

据史书记载，魏晋南北朝时期曾出现过250多部文学总集，但真正流传下来的，只有《文选》。这是因为《文选》的选材标准符合文学规律，所选作品大多为经典之作，且对古今文体的阐述和辨析也都高屋建瓴，鞭辟入里。

萧统编纂的《文选》以“经世致用”的文学思想为指导，为后人提供了学习的范本。其中的经典之作，蕴含着丰富的写作手法与表现形式，对后世文人的创作产生了积极的影响。李白、韩愈、苏东坡等人都曾熟读《文选》，并从中产生灵感，借鉴技巧。